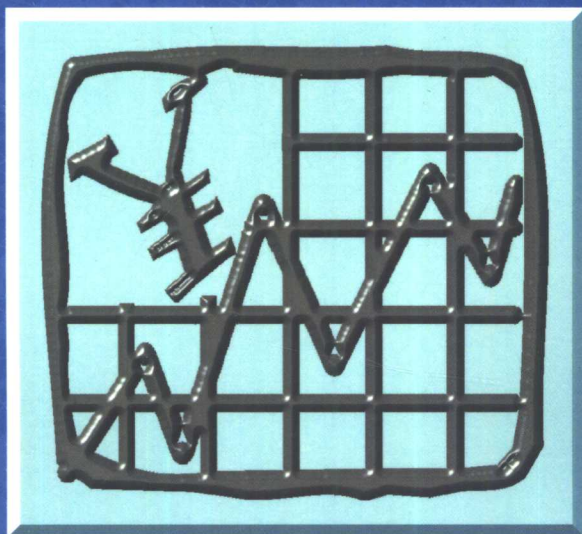


博导文丛

支撑经济增长

——中国消费·储蓄·投资研究

刘方棫 张少龙 主编



华文出版社

支撑经济增长

——中国消费·储蓄·投资研究

刘方棧 张少龙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消费、储蓄、投资研究/刘方斌,张少龙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

ISBN 7-5075-1077-8

I. 支… II. ①刘…②张… III. ①消费—关系—经济增长—研究—中国②储蓄—关系—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29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cbs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cbss.com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2.5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22.00 元

总 论

我国居民消费的历史 巨变与前进方向

一、我国居民消费演进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又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低通胀——高增长”、“通货紧缩——适度增长”,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市场,以前主要是卖方市场,现在则是买方市场天下,市场供应过剩已不再是一种端倪;二是经济运作,以前主要依靠总量扩张和扩大投入,现在则主要依靠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来推动,商品质量、品牌、价格已成为企业优胜劣汰的关键;三是消费者的心理行为,以前消费者支出的基本投向是以温饱型为代表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选择性较小,主要是追逐数量上满足。现在随着居民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增加,消费的基本投向已从生存资料转向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选择性强,关注和追求的是质量、档次和精度;四是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和购买行为已成为企业再投入和再产出的方向标志,消费的热点已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同这一变化的背景相适应,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表现为: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储蓄和金融资产有了明显的提高

1996年,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4377元,比1991年提高

了 41.6% (已扣除物价因素), 5 年年均增长 7.2%。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1926 元, 比 1991 年增长 28.8% (已扣除物价因素), 年均增长 5.2%。1997 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5160 元, 1998 年增长到 5425 元, 1999 年又增加到 5854 元, 比 1952 年分别提高了 33.8 倍和 35.1 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1952 年的 57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 2162 元, 1999 年又提高到 2210 元, 分别增长了 36.9 倍和 37 倍。

居民收入的连年增长, 带来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据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于 1996 年 6 月在北京市 18 个区县 (包括 14 个卫星镇) 的 1550 户不同类型家庭的调查显示, 1996 年 6 月末, 北京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户均 68756 元, 其中金融资产为 39873 元, 占总资产的 58%, 实物资产为 28883 元, 占总资产的 42%, 反映了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占大头的是金融资产。在上述金融资产中, 居第一位的是储蓄, 占金融资产总量的 69.3%。全国城乡居民储蓄金额 1978 年底只有 210.6 亿元人民币, 1999 年底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 6 万亿, 与 1952 年的 8.6 亿元相比, 增长了 6922 倍, 人均储蓄由 1952 年的 1.5 元提高到 1999 年的 4700 元, 增长了 4600 倍。储蓄率高达 30% 以上, 实属罕见。居第二位的是企业债券和股票, 占金融资产总量的 14.9%。居第三位的是国债、国库券, 占资产总量的 9.0%。储蓄性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居第四位, 占总量的 2.6%, 其他金融资产占 4.3%。^① 这里令人刮目的是随着储蓄降息和股市风险加大, 广大居民生命“金贵”意识大大加强, 全国的保险业大发展, 人身险、财产险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1999 年财产险保险费收入 521 亿元, 人身保险费收入 768 亿元, 承保的险金总额高达 10 多万亿元。上述金融资产再加上居民的手持现金、外币存款, 估计实际已达 7 万亿人民币以上。

^① 中国信息报, 1999 年 11 月 26 日。

我国居民拥有如此可观的金融资产,决非偶然,是如下一些因素起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是居民货币收入的稳步增长,提供了金融资产增长的基础。“八五”期间,我国的 GDP 增长了 2.9 倍。“九五”预计将再增长 50% 以上。

二是我国人民历来有“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除了 1988 年通胀严重属非常情况外,居民消费的增长总是低于收入的增长,几乎成为近些年收支的既定之规。

三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国家统包的各种社会福利的原有格局,为了保证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体制改革后能应付预期出现的风险,有必要以预防型储蓄模式替代过去的速效型消费,从而导致居民家庭储蓄额的快速增长。

四是消费对象的层次性和消费热点形成的周期性。前一轮消费热已趋向满足和饱和,新一轮消费热则蓄势待发,尚未成熟之前,居民必须积蓄资金,跃过消费断层。例如,在家电消费热点和住房、轿车消费热之间人们就需要一个积蓄资金的周期,以渐变来迎接新的消费突变。因而在这一周期中,金融资产处于不断增长中。

(二)收入与金融资产的增长,带来了居民消费水平的逐年提高,消费层次也逐渐拉开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已从 1978 年的人均 184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 3094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消费水平 1998 年比 1978 年增长了 3.0 倍,其中农村居民从 1978 年人均 138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 1945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消费水平 1998 年比 1978 年增长 2.77 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支出从 1978 年的人均 405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 6528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消费水平 1998 年比 1978

年增长2.5倍。^①

根据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有关资料,现在我国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贫困型家庭,约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4%;年收入在5000至10000元的温饱型家庭,约占总户数的34%;年收入在10000至30000元的小康型家庭,约占总户数的55%;年收入30000至10万元的富裕型家庭,约占总户数的6%;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豪型家庭,约占总户数的1%,和收入水平相对应,消费层次也明显拉开。5万~10万元以上的高价位商品(如汽车、住宅)的主要消费者,是约占7%(6%+1%)的城镇富裕家庭;1万元级的家用电脑、家庭影院、移动电话等商品的主要消费者,是占总户数60%的城乡小康型和富裕型家庭;5000元级的家用电器、电话、家具等则是温饱型以上的消费者群体追求的对象。^②

(三)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表现为一定时期居民消费总额和人均价值消费量的增长,而且也反映在居民的消费结构的改善

在吃穿用住行等消费支出中,吃的比重下降,用、住、行的比重上升;在穿着消费中,非高档品比重下降,丝绸皮革等高档品比重上升;在用品消费上非耐用品比重下降,耐用品比重上升;在消费支出总额中,实物消费比重下降,精神品和劳务消费比重上升,等等。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已由温饱型消费转为小康型消费。具体表现:

1. 恩格尔系数有了较大幅度下降。恩格尔系数是指食物支出在消费者总支出中的比重。比重愈小,反映消费者在食物消费外的消费力愈大;比重愈大,反映消费者在食物消费外的消费力愈小。恩格尔系数在宏观上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富裕程度。联

^① 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27页。

^② 参见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和产业政策司宁吉喆的消费预测。

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规定:恩格尔系数高于60%以上者属绝对贫困型国家,30%以下者则为绝对富裕型国家。从1978~1997年,我国城乡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已从67.7%下降到53.43%;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已从57.7%下降到44.48%。肉、蛋、奶和水产品的消费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1~2倍以上。居民每日获得热量已达到2600大卡,蛋白质72克,脂肪58克,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2. 住和行的支出比重逐步上升。“小康不小康,关键在住房。”依照“小康标准”和“温饱之后上住行”的演进规律,大陆农村的“住”项支出,在80年代已达到了新的高峰,90年代仍维持着15%左右的增长高度。说明农村住房消费正处于现在收入水平上的基本饱和状态,1998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已超过23平方米,是1978年的2.5倍,钢筋混凝土住房和砖木结构住房及居住设施的配套率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已从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1998年的12.4平方米。城镇住房的建设投资连年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5%以上,保证每年竣工2亿多平方米。

随着城镇居住空间从市中心向外延伸,选择购买远郊区县既便宜又环境优雅的住房族迅速增长,于是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距离问题又使“行”的问题突现出来。进入90年代以后,城镇“行”的支出比重已从1.2%上升到5%以上。众多购房者认为,与其花40万元~50万元在市区黄金地段买一套普通公寓,不如减半只花20万元在远郊买一套私人住宅,再花10多万元买一辆中档车或几万元级微型车。所以,私人轿车进入普通居民家庭的速度加快。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国内每年需求汽车200万辆,保有量为1800万辆。为拉动内需启动汽车消费,应当调整和完善轿车消费的政策,释放汽车的消费力。特别是要整治不合理的“搭车”收费,规范市场行为和秩序,引导和开拓汽车市场,强化服务对策。

3. 劳务消费,城乡都已有了两位数的增长。随着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倡导和闲暇的增加,劳务消费特别是教育、卫生、文化和娱乐等非商品性支出比重,将呈现不可避免的上升趋势。

例如,我国的电信消费,从1987年至1997年上半年十年间已拥有移动电话1000万户;从1997年至1998年上半年,用户总数在一年间又增加了1000万户,如此增长速度,堪称“世界之最”。目前,中国电信已成为世界最大的GSM移动电话的运营者,占全球GSM用户的1/7。中国移动电话已覆盖31个省区直辖市,308个地市和1856个县市。若再加上非移动电话,总的电话用户已突破一亿户。手机通讯消费、本地电话消费、长途电话消费已鼎立三分,成为近年增速最快的热门。再例如,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对万科城市花园社区的调查,房主消费结构中“吃”只占31.7%,而体育、娱乐、购书报等文化用品和旅游的费用,竟占总消费的33.5%。

4. 城市儿童、子女的消费趋高。根据北京美艺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五大消费先导城市的调查,城市儿童消费所列投入相当大,平均每户的儿童消费每月高达672元。其中北京、上海的消费最高,达每月764元和736元。另据北大对万科花园社区的调查,子女和儿童的消费占了总消费支出的7%,这一比例反映家长宠爱子女和望子成龙而舍得花钱的一种心态,显然这同我国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政策有关,也成为居民家庭消费的一种趋势。

准确地把握中国大陆近年来消费品市场的变化和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变动,对遵循市场导向、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求得供给和需求的吻合,缓解和改善目前的生产相对过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过剩”是相对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高情况下出现的,局部发生于第二产业中某些传统制造业方面的过剩,不是全局性的(例如高科技和

第三产业仍然滞后),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的过剩。生产结构趋同,低档产品过多,市场旺销、特别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仍然供给不足,有赖进口解决。因而,只要我们使产业得到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把大力开拓市场和扩大有效内需正确地结合起来,结构性的过剩就会逐步缓解。

二、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问题

当前,外贸出口需求拉动作用有所增大,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政府投资远未带动非政府投资的跟进。首先是外资。由于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外商对人民币币值的信任预期降低,因而外资投入呈下降趋势。其次是内资。对内资的开放度不够,对民间资本仍有相当大的体制性限制。在民间企业的债券和股票上市的直接融资渠道上,银行借贷资金的发放上,均未实行同一的国有企业待遇。再次,仍然存在着投资无热点,民间资本对未来投入的回报(利润率)预期值低,致使不少民间资本观望有余而投资信心不足。投资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消费需求是健全或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制约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供过于求市场格局的形成,使得占我国总需求的消费需求呈现疲软,成为对投资增长的重要瓶颈。即便投资增长幅度再大,也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消费不旺的根源在于:

(一)居民收入增幅下降

1992年~1995年是一个明显的高增长时期,此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幅为21.5%,而在此之后的1996年~1997年,平均增幅则降至一位数以下。收入增长幅度降低对家庭理财和居民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一般认为,消费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两种意义上的提高,取决于家庭收入“可稳定”部分的增长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实际情况看,1996年以前,工资总额始终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而到1997年以后连续两年

增长率下降至少 3.4% 左右。

当前居民收入增长形势更趋严峻：一是企业效益不乐观，职工收入增幅还会下降；二是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还将进一步增大，国家机构分流下岗人员会增加，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估计将剧增 1200 万人以上，其持久性收入的下降，影响总购买力的增加；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传统的乡镇企业发展处于低迷，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四是银行储蓄利率连续七次下调，加诸征收利息税（20%）使周期欲望受挫。

（二）居民预期收入下降

据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来对城乡居民储蓄户的问卷调查材料：在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幅减缓的同时，对未来一两年预期收入的判断呈下降趋势，反映居民收入预期状况的收入信心指数（即对未来收入判断的“增加”的比重减少，判断“减少”的比重增加之差）从 1995 年的高值（近 30）逐步降落（判断“增加”的比重减少，判断“减少”的比重增大），达到近几年问卷调查的最低值。

（三）居民预期支出上升

消费不足在市场条件下一般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造成的，但在目前还有另外的背景。许多人为此困惑不解：就中国人的目前消费水平来讲，远远达不到高质量，那么，居民为什么不把明显过多的储蓄拿出来进行消费呢？答案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与消费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关连，城镇居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强。这主要表现为：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及教育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未出台的即将出台，已经出台的将进一步深化，这使消费者对未来支出的确定性、依赖性心态演变为不确定性、无依赖心态。随着经济的放宽搞活，居民生活、服务市场化步伐日益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体制转轨的速度。过去认为那些理

所当然应该由国家全包下来的待遇和福利,慢慢地都变得无法确定了。从前住房是由单位分配,虽然存在着不公平但也用不着花钱购买;孩子上学是由国家义务教育来保证的,学杂费与房费一样都是象征性的,低收入群体、工薪阶层基本上负担得起。至于公费医疗,只要参加工作便人人有权利享受,不管得多么大的病,也不管花多少钱。当这一切随着改革日益变成由个人或家庭负担或负担一部分以后,消费者就再不敢掉以轻心了。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昂楼价,得一次大病,足可以使人倾家荡产的医药费用,令人惶惶不安的来自子女学校的各种收费通知,自然使得本来就没有足够积蓄的居民减少现期消费,或推迟中远期消费。

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了风险意识,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新变化。这集中体现为储蓄倾向持续居高位不降,居收惜购现象严重,消费倾向性下降,且难以改变。从近两年的社会调查看,属于为应付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之需的储蓄动机,占有最大比重,即使连连降息,储蓄上升的趋势,也难以逆转。

(四)存在着消费结构替换和水平升级的障碍

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前半期可以说是消费水平跃升的时期,人们竞相追逐着一个个消费“热点”,从收录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到电话、空调器、家用电脑和大哥大。而当前消费结构则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使供求难以均衡,不相适应。

一是消费无热点。在百元、千元级消费实现之后,消费水平向万元级以上的跃升,面临着明显的障碍。在百元、千元级消费阶段,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领先于个人或家庭的即期收入与共同积蓄,但是,当消费需要跨越到万元以上消费阶段时,完全依赖于这种“攒钱消费”的模式,已是大多数城镇家庭无法实现的。在中国传统消费观念下,消费信贷这种金融方式无论规模还是供给的多样性,都还难以大面积地推广和让消费者立即接受。

二是收入与消费的“二元结构”特征日趋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上。1998年占全国人口70%的乡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仅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425元的44%左右,乡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占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24.8%;而若考虑到区域间的不平衡,即沿海、城郊与中西部农村之间显在的收入梯度,实际的收入、存款的差距会更大;另一方面,在城镇,实际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也正在扩大。据统计,1998年城市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比1978年扩大了10多倍,少数的高收入群体对十万元级消费已可轻松应对,而大多数家庭还难以面对几千元或上万元级的购买决策;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分化,导致了明显的消费——大多数城镇居民对一般消费品有较强购买能力,但对万元级商品则难免踌躇,至于对轿车、住宅等十万元、几十万元级商品则更是难敢问津。

三是消费行为明显由“趋同”转向更为个性化,消费群体也出现了分化。市场供给的丰富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选择来满足偏好,从而使消费结构变得更加带有个性色彩,模仿性消费的冲动减弱,这导致反“排浪式”的个性消费进一步增加,意味着一方面需求种类相当分散,偏好的离散性大;另一方面,需求的层次趋向细密,消费者的“个性化”也在扩大。消费行为的变化,要求供给更加多样化和富有灵活性,这对企业的决策、产品设计、生产柔性、营销和服务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而多数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还远未重视市场调查,摆脱粗放经营的积弊,难以适应这种消费行为的变化。

(五)消费环境和过时政策的影响

从生产供给方面来看,当前流通领域除了存在部门和地方封锁割据、行政性垄断、人为阻滞商品流通渠道的弊端外,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充斥于市,也是加剧市场滞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粗暴地践踏了消费者通过自主选购、

实现消费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严重挫伤了购买积极性。尽管政府有关部门不断加强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收效不小,但要建立起规范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机制,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同时,生产者的经营观念也不完全适应新时期消费市场的变化。例如,对于当前“同质消费”趋势日益下降的情况,许多厂商未能及时拿出有效的方案来吸引不同个性的消费者;供给市场不能适应农村市场的需求,广阔的农村市场未能真正启动。种种结构性的供需矛盾,都阻碍了消费需求的实现。计划经济时期出台的某些抑制消费的政策及消费环境不良,如道路、住房和供电不足等等限制,影响了汽车、家电等耐用物品的消费增长;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和财税体制,有一些是在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为了抑制投资冲动和消费需求膨胀而制定的,显然不再适应当前“双启动”的形势需要。

三、治理我国现行消费需求疲软的基本思路

常规性财政扩张政策及利率调整作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从政策调整转向体制创新,将体制朝着有利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方向,无疑是推进经济回升的正确选择。当前,为使政策及体制调整到位,必须重点解决宏观上的市场消费需求疲软问题。

(一)遵循收入是消费的函数的规律,提升居民收入预期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是影响和左右居民消费趋势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近几年来,居民消费需求不旺、热不起来,是经济持续低冷、回升困难的重要原因。现在政府采取增长工资收入的政策措施显现出了扩大消费需求的一定效果,可以使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上升,消费需求由冷转暖。

消费需求上升使宏观经济出现回升迹象,零售物价月环比指

数由下降转变为上升,使实施财政扩张政策以来“财政投资力度越大、通货紧缩越严重”的矛盾局部得到缓解。由居民市场购买行为拉升起来消费需求,对企业的市场性投资起到导向作用,从而宏观经济显现出需求拉动投资的机制性回升苗头,但是,这种机制性回升是否能持久,仍取决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及各项改革对居民支出的格局。

近些年来,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主要是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不稳。下岗失业人群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失业及收入下降的威胁。职工退休、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市场化改革无情推进,国家和企业曾经允诺的福利保障和供给大幅度缩小或取消。这种改革将传统体制下职工的福利保障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诺承担,改革为市场机制下让职工部分或全部承担。这样的改革,减轻了国有企业社会福利负担,有利于企业转变为市场型经营实体,职工当然应对自己的未来保障分担风险。但是,这种大量增大职工未来保障风险的改革,是在职工收入未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推进的。职工未来保障市场化的改革,本来是以职工个人可支配收入能够在满足当前消费和应付未来保障支出之间作出兼顾性为条件的,现在社会保障、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等改革造成职工个人对未来支出的风险分担量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职工个人当前和可预见未来时期货币收入可承担的程度。这种不使职工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使职工未来保障支出负担大幅度增大的做法,虽使国家和企业轻易地实现了减轻支出负担的改革目标,但却迫使广大居民群体必须挤出一部分当前收入用于储蓄应付未来不时之需。在当前由国家和企业保障向社会化保障转变、完善的社会化保障体系前景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更是宁可压缩当前正常消费而增大储蓄,迫使具有理性收支预算行为的广大居民家庭不得不厉行节约,使居民家庭可用于当前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当改革家们在欢呼福利保障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低

成本顺利推进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改革进展所导致的居民储蓄倾向增大及消费需求不振,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严重后果。显然,消费倾向减弱的情况得不到改变,在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持有不乐观预期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热不起来,整个宏观经济就很难升起来。为了有效地刺激需求,应该继续大力增加居民的收入。不久前我们对公务人员提升了一次工资,这对启动消费是必要的。但就全社会有效需求来说,这个刺激是远远不够的,收入的增加只有达到一定数量时,才会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应该在人们预期支出增大的情况下,大力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提高人们的收入增长预期。

(二)依据启动消费拉动有效需求的规律,实现消费主导型经济,必须扩大内需、转变结构、更新观念和调整消费政策

近年来我国的消费和储蓄倾向失衡。表现在居民收入中有35%以上用于储蓄。有一种意见认为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会有效促进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因此主张降息以刺激消费需求。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在目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特殊条件下却不适用,反而可能带来制约消费的“反挫”效应。消费学的研究表明,消费革命有一个发展和升级的周期,从追求基本生活资料,到追求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存在一个消费力的蓄能期,即收入的蓄积过程。从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这个阶段大约是7年左右,我国也经历过从70年代末追求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到80年代追求生活质量提高的消费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从追求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到追求扩展居住面积、高档装修、厨卫革命以及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更需要一个“蓄势待发”的新的消费革命。我国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已经经历了大约10年左右的蓄积消费力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以突破制约消费的临

界点,在于消费收入的稳定增长。我国目前最大的收入增长源之一一是储蓄的收入,连续降息削弱了消费革命的势能,延长了蓄势待发的周期,使新一轮消费周期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实践证明,近年来连续降息并没有刺激消费,根源就在于消费革命在蓄势过程中,储蓄是消费者投资的最佳选择,也是工资外的主要收入增长源。降息使居民收入下降,反而降低了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函数,直接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一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量,近年来逐年下降,收入的存量也因下岗人员增加、乡镇企业发展趋缓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下滑而停滞不前。而且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扩大趋向,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已达0.4的新高)。因而,中间收入阶层受收入增长减缓影响,消费势头降低;而高收入者消费已达到一定的饱和边界,因而其边际消费倾向趋低;低收入者尽管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支出能力;从而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降低。

二是消费支出的预期不乐观,消费者信心下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扩大了居民的预期支出。住房制度的改革又正在大幅回笼居民的储蓄和手持货币,致使居民面对未来支出增长的预期而强化了其谨慎的消费心情。

三是消费环境建设严重滞后。由于我国电力短缺、电力设施落后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限制了家用电器以及轿车进入居民家庭。尤其是广大农村,电网落后,电力事业的体制改革滞后,电价过高,致使家用电器难以进入广大的农村市场,造成产品积压,企业开工不足。

四是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的改革不到位。例如购买使用汽车的各种税费过高,约束了汽车市场的发展。一些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已经过时的限制消费的政策,例如电话初装费,购车附加费和占地费等不合理收费,仍未得到及时清理。启动消费、扩大内